

王守仁研究系列资料之三

王阳明教育论

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图书馆

网上辑录资料

20031110

王守仁研究系列资料之三

王阳明教育论

1. 王阳明教育思想探讨 / 钱念文 / 宁波师院学报 1991/1
2. 王守仁教育思想新探 / 夏敏 /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4/2
3. 王阳明教育思想的特质与创见 / 方国根 / 东方论坛 1996/4
4. 王阳明教育思想的人文精神 / 朱颖 / 唐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1
5. 王阳明教育思想与现代素质教育之比较 / 诸焕灿 /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01/1
6. 王阳明的教育方法刍议 / 王路平 / 浙江学刊 1995/4
7. 王守仁教育方法论 / 陈增辉 /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9/2
8. 王阳明教育哲学中的独到主张及其现代意义 / 陈增辉 / 东方论坛 2000/1
9. 王阳明的哲学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 陈锐 /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 10 王守仁自我教育思想述评 / 渠长根 / 杨喜洲 /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0/1
- 11 王守仁教育心理思想初探 / 李雅琴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S1
- 12 论王守仁的音乐教育观 / 孔义龙 / 交响 -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1998/3
- 13 王守仁与江西书院教育 / 魏佐国 / 李萍 / 南方文物 1997/1
- 14 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积极意义 / 黄晓众 / 刘明华 / 贵州文史丛刊 1997/3
- 15 略论王阳明的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 / 任满丽 / 贵州社会科学 1996/3
- 16 试论王阳明的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 / 任满丽 / 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6/2
- 17 试论王守仁的童蒙教育思想 / 程龙生 / 教育探索 2002/2
- 18 论王阳明的儿童教育思想 / 戴斌武 / 熊星 /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4

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图书馆

网上辑录资料

20031108

王阳明教育思想探讨

钱念文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史上,在政治、军事、学术和教育各个领域,都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位极为罕见的人物。后人赞他为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他34岁(1505年)首次讲学京师,开始“授徒讲学”起,提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①同湛甘泉“以倡明圣学”为已任,就终身履行,历二十三年之久,一贯以传道者的精神,致力于教育事业,而未有任何间断。

公元1508年,阳明37岁,贬谪少数民族聚居之处的贵州龙场驿。在万山丛岭中,由居民协助构建龙岗书院,开创了黔中第一所书院,他拟就《教条示龙场诸生》,提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为学规,遂以在这个流放地讲学为最大乐趣。他说:“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②次年,则应提学副史席书之聘,在贵阳主持贵阳书院(应为“文明书院”^③),这一时期,就是阳明龙场之悟后,从自身实践而体悟“心即理”的意义,摆脱了朱熹心理为二的问题,始以“知行合一”教人。1510年(39岁)他离开贬所升任庐陵知县,喜与人讲学,以德化民,使全县大治。湛甘泉称许他:“卧治六月,而百务具理有声。”1512年调南京任太仆寺少卿后,授徒讲学四年,讲学的规模日益扩大。1513年至滁州督马政,“地辟官闲,日与门人游遨琅琊漱泉间,月夕则环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④1516年巡抚江西期间,平定南赣民变后,倡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即使戎马倥偬之际,他仍不忘收留许多弟子住在赣州练兵场。后来人数日增,又修了濂溪书院,来容纳四方学子。1519年(50岁)大集诸生于白鹿洞书院讲学。1520年起归省在绍兴的五年间,先自辟稽山书院,后由门人立阳明书院,并在余姚龙泉寺中天阁进行讲学,是时,湖南、广东、直隶以及南赣、安福、新建、泰和等地学子闻风纷纷而来,这正是阳明完成讨平宸濠叛乱大功之日,而反遭武宗宠臣张忠、许泰等忌恨诬陷之秋,他的内心是极端复杂而痛苦的,报国有心,而回天无力!但这也促使他修身养心,深切体会到“良知”二字,是千古圣人相传的骨血,从而明确提出“致良知”之教,主张动静结合,在事上磨练,最后归结出四句教法的历程。1527年他总督两广,平定思田之乱,就以用夏变夷的方式,兴办思田学校、南宁学校,教化少数民族致力孝弟,订立乡约。然后又办起敷文书院,以“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

从以上教育活动概述中,可以看到阳明的一生,不论是官运亨通,或是仕途蹭蹬;不论是戎马倥偬,或是省亲休养之际,所到之处无不兴学讲授,阳明履行儒者“上说下教”的教育传统精神,以立社学、办学校教化平民安生;设书院授讲学,以提高士风。同时,阳明的为学教人的历程,即是他从龙场之悟为开端,摆脱朱熹之教,另辟一条新途径的历程。这样,王学渐渐由近及远,从游和私淑者日益增多,弟子几遍布国中。据《明儒学案》所记载,南

卷十一至三十六,有可查考的弟子凡144人;余重耀阳明弟子传纂三卷,含目录及见于年谱、宗派、体本、书牒者,共达307人(内目录146人,其他161人)。当时门人王畿推崇阳明说:“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泽究生民而不宰甚能,教彰士类而居其德”,“推荡出入于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③甚至到明末清初,黄道周进一步肯定他可与圣人伊尹并尊:“有圣人之才者,未必为圣人之任;当圣人之任者,未必成圣人之功……文成出,而明绝学,排俗说,平乱贼,驱鸟兽……伊尹以来,乘昌运,奏显绩,未有盛于文成者也。”^④

另一方面,阳明生前卒后,都备受官场上宵小们和权贵们对他的攻击、诬陷。嘉靖元年礼科给事中章侨、御史梁世鏢攻击王学为异学,上疏说:“三代以下,论正学莫为朱熹。近有倡为异学者,乐陆九渊为简捷,而以朱子为支离,宜严禁以端士习。”^⑤后来世宗批准,明令宣布学禁。甚至当阳明重病回乡死于归途的死讯传到京师,吏部尚书桂萼竟攻击他“擅离职役及处置广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⑥明廷在桂萼的主持下评定:“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沿祇,悖谬弥甚。”由此为了“禁邪说以正人心。”^⑦决定停止阳明新建伯爵位的世袭,取消葬仪和抚恤。明末清初,顾炎武也指斥阳明为明亡的罪魁祸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⑧由于上述对阳明的攻讦,使他盖棺不能定论,甚至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承受不白之冤,承担无辜之责。其中就顾炎武来说,他对一个王朝兴替的复杂原因,是无法理解的,亡明的原因,还得从“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上去探索,阳明个人的作用,是无法为建国达二百七十多年之久的明朝灭亡承担任何罪责。即令顾炎武对“良知”消极意义的评价是完全确切的,似乎也只是夸大了阳明良知说在历史上的作用。至于明代权贵的种种贬斥之词,归结到一点,就是阳明学的传播,直接触动了朱熹理学的统治地位,必将引导人民摆脱思想的禁锢。所以从另一角度上来看,不论是顾炎武为明亡而慨叹,或明廷权贵为卫护朱学至尊地位而贬斥阳明,而这恰恰证明了阳明学术思想和教育活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占有重要地位及其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1529年11月阳明发丧时,“门人大会葬者千余人”^⑨,民间对他的敬仰和私祀者遍及天下。直到隆庆初,阳明去世已经四十年,才给他平了反,穆宗赐祀改为官祭。据记述:“凡祠祀书院,合计不下数百所,亦繁盛矣。《勋贤词志》云,书院七十五所,祠四百二十所。”^⑩足见阳明的教育影响所及,在有明一代已蔚然成为学术之主流,举一时理学之大纛。而他在摆脱朱学禁锢,直宗儒家师承方面所起的作用,颇有类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中的加尔文派。

一、“四句教”为教育宗旨

公元1527年(嘉靖六年)阳明出征思田临行前,门人钱德洪和王汝中在学术讨论中发生分歧,于是阳明提出了“四句教”说:“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心;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⑪又说“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只要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⑫同时,王龙溪《天泉证道记》也说:“阳明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⑬《年谱》亦述

他曾说过：“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可见四句教在阳明一生学问进展上居有关键的地位，是他晚年作了这样概括，是教人的定本，也可说是教育宗旨。

四句教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教育思想，包含着本体和功夫两方面，而功夫的内外方面也是一个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就是所谓道德的理论和实践。重点在于教人做工夫，并不限于客观的为心意知物下定义，更不在空谈本体。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其含义是“心之本体原无一物。”^⑩ 宇宙间的一切，原是无善无恶，都是自然如此，并无任何目的。所谓善恶是相对的，也难预先定个规矩，要“随时变易”，“须是因时制宜。”^⑪ 所以无善无恶才是一种至善，把善作为手段，道德作为谋取功名的资本，就丧失了善性，那就是有善之善丧善，只有无善之善才是真正的善。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意之动”就是心体与外物之间的交互作用，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⑫ 它包含心体自身的本能体现和心体与外物交互而受到障蔽的两层意思，前者是意动之善，后者是意动之恶。但心体之动，并不意味着其心体自身的消亡。所谓意动的有善有恶，正是心体自身的判断结果，换言之，心体正是对其动的结果有善有恶，作出最终的判定的。

“知善知恶是良知”，就是“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的内在逻辑必然的延长。“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⑬ “良知”是阳明哲学中的最高范畴，它不仅是个体经验的知识能力，关于善恶、是非的知识的判别能力，而且是先验的知识本体，它的存在是绝对的、天然的纯粹理性，因之，所谓意动的善恶是非，是受到良知的先验理性的最后裁决，“良知”与“意动”之间，构成判断与被判断的关系，是问题的核心。

“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良知对意动作出最后裁决后，必须对心体外部行为加以合理导向，因而“格物”就成为实现先验理性的必由之路。阳明的所谓“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⑭ 他认为，物就是事，物只是意念之所在。“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⑮ 这就是说，物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内容，而不是离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把客观对象看成主观活动。因之，格物不是考察客观的事物，而只是改正自己所思所念，最终的道德修养就在于为善去恶，即“为善去恶”是教人功夫的落实处。

概括四句教的精神：心本来是超然于善恶对立的，所以是无善无恶的至善；意念发动，便有善恶之分，良知自然能判别善恶；道德修养功夫，就得落实在为善去恶，恢复心体明莹无滞的境界。

显然，阳明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是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四句教中的心体观，更是吸收继承佛者“空”、“无”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无求其异同于儒释，求其是者而学焉可也。”^⑯ 《年谱》也记述他：“儒佛老庄皆吾之用。”但其基本精神，却是继承发展了儒家思想的“性相近、习相远”和“性本善”的观点，而与佛老又有根本区别，主要的佛出世，阳明是入世。佛的“空”“无”是主张一切听其自然，阳明说：“佛氏著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⑰ 并批评佛学是“自私自利”的“是以外人伦，

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②

四句教的心体说,与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也是有区别的。告子是以人的食色为性,即是一种生理本能,以人的生物属性为性。阳明在《传习录下》曾有所剖析,认为生理本能的性,是人性的一面,并且是非本质的一面。人还有良知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一面,而且这是主要的、决定的一面。告子的“人性”无善无恶是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始终没有把无善无恶与至善统一起来,其归宿还是无所作为的一种消极思想。阳明无善无恶的心体,是指人的道德属性、社会属性,是追求人的共同理解,共同情感,就是具有能知善知恶的良知,包含着为善去恶的要求,必须通过为善去恶来实现,即无善无恶与至善是统一的。

阳明从龙场之悟,以至五十岁揭良知之教,其间虽经几个阶段性的思想转变,如传习录上多说诚意格物,传习录中下则多说良知致良知。但对心意知物的解释并未改变,而在教人做工夫的问题上,不断探索着更为可靠的依据,其重点似有暗中移步换形,最后提出四句教是把他的教育主旨进一步综合化和精一化。从教育思想史上来分析四句教的意义:以心体的无善无恶为基础,否定了圣人与凡人的区别,指出人人都可教育,激励人的自尊自信;意之动的有善有恶,说明人不免有种种习心,使本体受到障蔽,故人人都无例外地应有不断受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人人先天的良知来判别善恶,并以此为标准,而不是以外在的道德规范作为是非标准,充分肯定主体道德意识的能动作用,重视自身的内在因素,归根要人下工夫,达到为善去恶而明变的教育作用,改革道德与事功脱节的现象。这种探究“心之本体”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引导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强调人的主体意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作用,肯定每个人原来就是可以教育好的主张。对照被称为西方新教育学奠基人夸美纽斯所说的:“我们已经知道,知识、德行与虔信的种子是天生在我们身上的;但是实际的知识、德行和虔信却没有这样给我们,这是应该从祈祷,从教育、从行动去获得的。”^③可以看到,是有着某些基本的类似之处。虽然阳明主要局限于人伦道德教育的范畴,但他却早于夸美纽斯一个世纪,而当时的中国,又正是朱学“绝对权威”的一统天下,这就不能低估王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意义。

二、“成天下治”为教育目的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群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阳明自称为“狂者”,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④始终不渝地探求以国泰民安,长治久安为目的,从事于教育事业的“狂者”。

阳明经历了明朝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四位帝王的统治时代,正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而明皇朝的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具体的表现:首先在社会政治方面,建国初创业之主那种革旧布新的雄心壮志,已被日趋败坏的风气所取代,弘治以降,正德嘉靖年间,朝政腐败,武宗四出巡游,荒淫无道,宠信宦官,厂卫特务组织密布;世宗迷信道教,经年不朝,中枢政权宦官和权臣的权力之争,终年不绝,伴随而来的皇室与藩王之间的内讧、地方与朝廷的权力争夺也日益激化,边患不息,内乱频报,社会经济萧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阳明严肃地指出危机的根源说:“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挟交嬖蔽雍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匡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

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不可支持，而不自觉。”^②进而又直截地抨击说：“权奸当事，谗嫉交兴”。结果“朝廷失信于民”，“百姓归怨于上。”^③就是说，官吏品质的败坏是社会动乱的主要祸根。

其次，在文化学术思想方面。两宋以来，程朱理学的兴起和提倡，到明初成祖以钦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理性大全》三书，诏颁天下，朱学更进而成为“帝王之治”，“用之于国的统治思想”，使得当年儒林几乎已达到“非朱子之传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④的地步。从而阳明悲叹：“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术，可悲矣！”^⑤并指出当时学人把求知识学习竟成为：“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敝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只不过是假借“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⑥的名号，来实现个人的以公济私。于是使社会风气极端败坏。

阳明晚年（55岁），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古代王道之治，基于财产的公有，周朝以来，私有制的出现，人们无地可耕，王道之治就衰败了，“然其时圣学尚明，士虽贫困，犹有固穷之节，里闾族党，犹知有相恤之义。”直到后世，道德沦丧，相互争权夺利，人已成为“外冠装而内禽兽。”^⑦他为此感到忧惧！

阳明针对“民风不善，教化未明”^⑧的情况哀叹：“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为之倡焉耳。”^⑨于是他“以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为教育目的，即在改变学风，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和根本素质，达到治国平天下。因此阳明到处收受门徒、兴办学校修筑书院，以倡明圣学为己任，倡导“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大同”。这样“则自能分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天地万物一体。”^⑩

为了提高人的素质，改变社会风气，阳明在致力于“变士风”的同时，还提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⑪深切感到，社会环境、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重大影响。因此，他每到一处，积极建立社学，订立乡约，大力推行社会教育来易风移俗。社教的对象，不仅限于童蒙的教育，还要“化喻其父兄”，及邻里之间的互相教育；其教育内容：“不但勤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⑫“务使人知礼让，习诗书，丕变偷薄之风，以成淳厚之俗。”^⑬对所平定的地方，明令勤于农业生产，孝顺父母，抚养子孙，保家卫国，使各安其业，甚至对社学、乡约的推行，提出：推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礼貌，特示优崇，使分投巡访劝谕”^⑭的制度，来巡行督导，促其切实建立社学、乡约的实施。

阳明把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从儿童到成人，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从品德教育、知识传授、生活教育融合为一处的见解，可说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开创了全民普及大教育的尝试，真正力行了教育为立国之本。

不过，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教育又是一个永恒的范畴，从这一角度来说：教育家的政治立场与其教育思想这两者之间是互有直接与巨大的影响的，但又不能等同看待。相反的史实，中外教育史上都存在，现在暂不提历史上评价未定论的孔子，就以希腊柏拉图为例，他的政治倾向是反动的，而人们无法否定他对人类教育思想宝库所作

出的贡献。阳明从心学的观点出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提出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更被人曲解他的教育目的,只是“兼有刽子手和牧师”的自供。事实上,这句话是包含两层意义的:一层是说军事镇压造反是容易的,要取得民心却是难事;另一层是对人的修养而说,要真正消灭内心的“私欲”是难事,并不专指破灭贫民心中造反的思想而言的。从这句话的出处看,明明指的是“诸贤扫荡心腹之寇,”^③他是更重视知识分子灭自己心中的私欲。而且阳明尤其关注破统治者的“心贼”,他曾说过:“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间,人不是谪,是谓正一君而国定。”^④

所以,阳明“为天下治”的教育目的,简单地给以否定,这是不公平的。应该说,他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教育目的,这是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仁者,爱人”、“民为贵”的思想,并开始突破传统思想中对“民”或“人”的重视,仅仅局限于作为统治对象的范畴,而是转向重视人的主体作用,以提高全民道德素质作为治国的根本。阳明的办社学、立乡约的立脚点在于“教”,不同于王安石立保甲法的立脚点在于“管”。他要求造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⑤这种教化平民要勤俭谦和,求得生存,固然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但在培养人从周围切近的人际关系入手,自然会导致人对人的关怀,从而扩大到社会群体的责任心,所以就长远的观点说,这对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和人类的共处是有其永恒价值的。

三、“学为圣人”的育人目标

阳明发扬了中国教育史上“传道、授业、解惑”的思想,提出了“修道之谓教”的主张,反对德、智分离,即“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他说:“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道问学,只是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系!”他是把教育和智学看成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道问学即以尊德性。”^⑥并把整个学校的教育过程,认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这就是明确地主张,德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教育是学会做人,是为了育人。

培养什么人?阳明从良知是人所固有的观点出发,旨在培养成一种安分守己、勤业务正的善人,善人修养到尽头,即成为圣人。由此其培养人的终极目标是“学为圣人”,所谓“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⑦这要人们自尊自信,人人具有同圣人一样的秉赋,关键在致力于本身的修养。他说:“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在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⑧这是反复阐明,成圣人的根本,是人人都存在的良知,由于奋力于“致良知”的功夫不同,才有“圣人”、“贤人”和“愚不肖”的区别,即令是“愚不肖者”之流,他秉赋的良知,同圣人还是一样而无差异。所以,“圣贤之道,坦若大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⑨而且“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⑩他还再三勉励学生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⑪并指出“学为圣人”的具体条件:

首先,圣人并非是“全知全能”的人。“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天下事物,如名物

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得知？”^④这是说，圣人只求知天理，不在于经验知识之多寡。他批评说：“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上求圣，……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人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其次，承认“一个人能力有大小”的客观事实，对人并不强求一律。圣人好比精金，不在分量多少，而在足色。阳明举例说：“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所谓圣人的标准，在于人的精神面貌，追求“纯乎天理”纯粹的人，“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⑤

归纳起来，阳明的所谓“学为圣人”，不仅仅限于博学多才，学有专长；决不是追求功名成就，任官、成名，富贵显达，而主要在于追求较高层次的道德品质修养，在于“知个天理”，“能个天理”，“尽个天理”，其功夫就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这样，不仅成圣人的条件，由可能成圣，改变为当下成圣；而且成圣的标准，也由外在固定的标准，更新为内在的自家标准。把抽象的、概念化的圣人成为可以由每人自己塑造的“自家有的”圣人。

“学为圣人”基本上限于儒家伦理的道德劝谏的范畴，继承了“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天地万物一体的仁”。但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意义，却又是突破了自孔子提出的“上智下愚不移，经过孟子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至韩愈的“性三品”说，即“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其品则孔子所谓不可移也。”^⑥这是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⑦而阳明却把圣人与凡人放在平等的地位，使封建统治阶级崇拜偶像圣人与其轻视对象愚人，在人格上平等化了。当学生提出上智下愚问题，他明确而又肯定地回答：

“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⑧正如其诗所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观，枝枝叶叶外头寻。”^⑨所以，有理由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无异为后世启蒙思想家敢于破除偶像崇拜，而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打开了大门，进一步激励人民，只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能使“虽愚必明，虽柔必强。”^⑩这种自强不息的振作精神，显然是值得后世人民敬仰的。同时，对“学为圣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要求具有崇高品德、纯乎天理、有益于人的“圣人”，对此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一笔抹煞，是有失公道的。其实，在教育史上，道德品质的继承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如关心人、尊重人等等，这却是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相互合作的要求而产生的，也是对人类社会有着永恒的价值。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的根本利益既是一致的前提下，关于培养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课题，对阳明的德育教育思想，无疑有进一步系统、全面总结的价值。

四、“立志”为核心的教育原则和方法

在“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指导下，阳明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不断吸取前人经验，形成了具有独特创见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主要的有：

第一，强调“立志”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学记》的“士先志”的主张，把立志作为教育的灵魂。“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水之根也，水之源也。……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⑪他还进而认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

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愒憩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立志而贤则贤矣。”^⑤ 这是把立志作为至高的要求,是事事处处的工夫,也是学习百行百业必先具备的先决条件。这是同他“心是主宰”的主观唯心主义相联系的,但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立志的极端重要性,教育学生建立起“圣无有余我,无不足所以知圣人之必可学也”^⑥ 的远大理想和坚强意志,力破学习过程中自卑心态,防止“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⑦ 确是不失为一条宝贵的学习和修养的经验。

第二,教与学的关系方面,提倡“学贵得之心”、“自家解化”和教师“点化”相结合的原则,从而主张率真进取的学风,反对束缚身心的教学方法。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⑧ 这是要求:学生求得一个“真是”,而“于心而是”的去独立思考,反对学习上的“墨守成规”,为追求“真理”要敢于“立异”,不要把教师、权威作为真理的化身。同时,他又说:“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当然,亦点化许多不得。”^⑨ 所以,阳明在教与学的关系问题上,主张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根本的主要的一面,“自家解化”,才能达到“一了百当”,同时他也看到教师“点化”的导向作用,使人能举一反三。这种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自觉性为主,和教师的合理“点化”相结合的教学原则,是符合事物发展以内因为根据,外因为条件的辩证规律的。

阳明更是关注从儿童心身发展的自然规律出发,进行合理的教育。他指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能已。”主张教师要顺应儿童天性,诱导学生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否则:“日惟督以句读课仿效,责其检束而不知导,……鞭撻绳缚,若待囚囚,彼视学舍如图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益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⑩ 当时,阳明提出这种教法,不仅直接反对程朱学派对经书“拘执比拟”、“支离决裂”的注释,束缚人们思想,而且是我国淳淳善诱,即“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勿达”^⑪ 的传统教导方法的具体发展。更值得我们重视的,阳明提出这种信任学生,以学生为学习主体,顺其天性的自然主义儿童教育理论,还早于卢梭的《爱弥儿》达两个半世纪。

第三,强调因材施教。阳明认为授徒讲学,无一定成规,应因材施教,犹如良医治病,无法先定下一个药方,必须对症下药,才能去病一样。他说:“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归于善。”^⑫ 归纳他的因材施教:

首先,因不同资质进行教育《传习录下》有一段记述弟子王心斋、董萝石出游回来,说他们所见到“满街都是圣人”,阳明对两人的所答却各有不同,因为“汝止圭角未融,萝石恍然见有悟,故问同答异,皆反其言而进之。”这是说,王心斋为人虽然浑厚,与人无忤,终究还露些锋芒;而萝石虽然尚未真切地见到圣人之道,但恍惚若有所悟,阳明就针对不同材性和觉悟的程度,给予不同的启发,使其上进一步。他还确切地说过:“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可见阳明是承认人们资质不同的前提下,虽有明确的育人目标,但不是用一个模式去塑造人,也不是用一套程式去教育人。而且他还指出:“你们拿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

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所以，因材施教的方式，还要平易近人，以凡人态度去感化教导。

其次，要“随人分限所及”来进行教育，即要依照受教者的可接受性和循序渐进施教。他说：“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要象栽培树木那样，应随大小浇水多少。教育人应随人可能接受程度进行施教。所以，“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⑩童子的学问就不能同大人强求一致，对他们进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品质教育，“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不能以干巴巴的说教来教育他们，而要渗透在诗歌、读书和日常生活之中，并进行多方面潜移默化的培养，“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和其故。”^⑪

同时，强调人的程度不同，“施教不可躐等”，对一般人“须漫漫琢磨”，“学贵精熟”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能自得之美。”^⑫切忌贪多求速，食而不化。他生动地把教学比作饮食说：“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问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⑬

第四，重视身教，倡导“著实体履”的务实学风。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教。他是把“知”分为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的，前者是知非的知，是先验的“良知”；后者却是承认外界事物的知，并不是先验的，而必须通过见闻才能获得，依他的话说，良知是“知之上者”，见闻之知是知之次者。因此，阳明主张：“学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⑭这就引导出：“学者本身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真切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⑮并且他在晚年尤其重在“事上磨练”用工夫。事实上，阳明一生，无论为学治事，一直贯彻笃实践履，重视身教，教育人“大抵工夫须实落做去，始能有见。料想臆度，未有不自信误人者矣。”^⑯就是要人在学习和道德修养上，必须从笃实践履下功夫。值得注意的，他对伦理教育方面，强调封建道德准则付诸行动，曾自述他的“立言宗旨”是针对把知行分作两件，“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因之，不能把“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简单地说成“以知代行”，而从教育人的角度出发，应该说是教育上的严格要求，要人时刻对待自己的思想活动，着重于笃实践履的精神。正如他明确的指出：“如言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扶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⑰

阳明主张以身作则，通过实践学习，付诸行动，这是针对宋明理学家的言行脱节，并为往后明清以来浙东学派的“务实求是”，经世致用的学风，起了开导的作用。

第五，对待人的过错和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阳明把“改过”、“责善”列为教规。关于改过，提出：“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率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就是说，“错别难免”，“贵在改过”，提倡“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和“痛自悔咎”，敢于改正。关于责善，认为是“朋友之道”，主张对人，“须忠告而善道”，“虽然我以为善而施于人不可也。”对己，“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对老师，不是没有可以批评的，应当“教学相长”，并且要求“诸生责善当自吾始。”^⑱

教师要带头能接受批评。这不仅认为贤与愚之间,同样是要犯错误的,并且提出改正错误,学习进步上的平等地位,特别是发扬了“教学相长”的精神,进一步要求教师起到榜样的作用。

综上所述,王阳明可说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真正从言论到行动,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的一位空前的人物。《明儒学案·师说》评述他教育上的成就说:“以教学者支离眩耀,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再孔孟以来未有若以深切若此著明者也。”诚然,象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阳明无法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打下了明显的历史烙印,但从教育主导思想,教育目的、培养目标以及教育原则和方法方面,他是全面、系统地继承和发身了中国优良的教育传统,尤其突出的,从他的心学体系出发,主张尊重人,反对约束学生身心;强调德育教育,虽提倡封建的道德规范,但没有具体的崇拜偶像。并把教育的范围,从传统的个人讲学、兴校,推广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从儿童教育广及成人教育,为中国倡导大教育的先驱者。如果说,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一位伟大的哲学思想家,那末,王阳明可称为明代集儒家教育思想于大成,开启后世启蒙主义的教育思想家,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划时代人物。

注:

- ①④⑪⑬⑮《阳明全书》卷三十二《年谱》
- ②《阳明全书》卷十九《诸生夜坐》
- ③刘宗碧、杨世峰《王守仁在贵州时期的哲学思想》一文
考证:王官期间尚无贵阳书院,仅有毛科修建的“文明书院”。
- ⑤《阳明全书》卷三十六《刻阳明先生年谱序》
- ⑥《黄漳浦集》卷二十一《王文成公集序》
- ⑦《明通鉴》嘉靖元年
- ⑧⑨《明通鉴》嘉靖八年
- ⑩《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
- ⑫《毛亚河全集》、《王文成传本续补》
-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传习录下》
- ①⑤《王龙溪语录》卷一《天泉证道记》
- ①⑦②③④《传习录上》
- ①⑨②④《阳明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
- ②③⑤《阳明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
- ②④《阳明全书》卷七《赠郑德夫妇省序》
- ③④《阳明全书》卷七《重修山阴县学记》
- ⑤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
- ⑥《宋元学案·横渠学案》
- ⑦《阳明全书》卷九《陈白沙疏》
- ⑧《阳明全书》卷十七《再批追征钱粮呈》
- ⑨《曝书亭记·道传录序》
- ⑩⑪《阳明全书》卷二《答罗整庵少宰书》
- ⑫《阳明全书》卷八《书林司训卷》
- ⑬《阳明全书》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念序》
- ⑭《阳明全书》卷二《答袁文尉》
- ⑮《阳明全书》卷十七《南赣乡约》
- ⑯《阳明全书》卷十七《颁行社学教案》
- ⑰《阳明全书》卷三十一《行等郡县建立社学牌》
- ⑱《阳明全书》卷十七《申谕十家牌法》
- 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阳明全书》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书》
- ①①《阳明全书》卷四《答方叔贤》
- ①②《阳明全书》卷十六《告谕各府父老子弟》
- ①③㉑㉒《传习录中》
- ①④《阳明全书》卷八《致魏师孟卷》
- ①⑤《阳明全书》卷四《复唐虞佐》
- ①⑥㉑㉒《阳明全书》卷二十《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 ①⑦《韩昌黎全集》卷十一《原性》
- ①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经情年鉴》书信
- ①⑨㉑㉒《阳明全书》卷十六《教条示龙场诸生》
- ②③《阳明全书》卷六《答季明德》
- ②④㉑㉒《阳明全书》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 ②⑤《学记》
- ②⑥《阳明全书》卷七《别王纯甫序》
- ②⑦《阳明全书》卷四《与薛尚谦》

王守仁教育思想新探

夏 敏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浙江余姚人,字伯安,他曾筑室绍兴的阳明洞中,创立阳明书院,故后世学者又称他为王阳明。

1 王守仁的教育活动基本上是和其政治生涯交织在一起的。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父王华是状元郎,官至吏部尚书。他自己也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并作为名臣武将直接镇压过赣南的农民起义。荡平了藩王朱宸濠的武装叛乱。后来率兵弹压、招抚了少数民族的反明武装。因而受到明朝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被封为新建伯,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从诗礼之家的宠儿,到官场上的名臣骁将,兼为传授圣贤之学的教育家,这样特殊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教育思想既丰富广博,又独具特色。

首先值得称道的是王守仁对教育的那份痴诚。他一生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但他从未放弃教育活动,甚至携弟子随军讲学。他在地方上办的书院遍及贵州、江西、浙江等地,如龙冈书院、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思日学校、南宁学校等等,晚年居越讲学更是盛况空前,以至于死前一个月仍在进行学术活动,对教育事业可谓呕心沥血。这位教育大师对我国的教育痴诚堪称后世楷模。

其次,王守仁教育思想的阶级性是十分鲜明的。他从为官为将的实践中认识到:“民虽格面,未知格心。”①要使封建统治阶级安享太平,除了“破山中贼”,还要“破心中贼”。通过“破心中贼”,使百姓洗心革面,俯首贴耳地屈从统治。王守仁生活的时代经历了明帝朱见深等四代。当时农业生产停滞,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和少数民族纷纷起义,阶级矛盾尖锐激烈。而朝廷中政治腐败,宦官恃宠横行,藩王争斗不已,东西厂特务、密探遍布全国,世风虚伪泄沓,民不聊生。在阿谀昏聩的诸官僚中,王守仁义烈的政治风度是极其少见的。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王守仁把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教育。他认为吏治腐败、世风泄沓、百姓骚乱都是由于心术不正、不明事理之故。所以他设院讲学,教人们存天理去人欲。

再次,王守仁的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认真研究了我国历代教育家的思想,批判地吸收了他们的教育理论与方法,结合明代中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自己新鲜见解和主张。他把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为“人人具有良知,不分圣愚比比皆然”。人不分圣愚都可以受教育这一朴素的民主思想,比孔子“惟上智下愚”不移的观点要进步得多了。

程朱之学是元明两代的正统思想。被奉为金科玉律而成为学校主要的教学内容和科举考试命题的依据。王守仁早年也曾师从朱子。但在以后的学习和教育活动中,他否定了朱熹,并对朱子在教育界的恶劣影响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说:“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遂不复有明伦之意。”②在朱

子控制的一统天下，王守仁以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举起反朱大旗，这在当时的学术教育界的确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对当时刻板僵死的儿童教育，王守仁也给予尖锐的批评。他提出了自己的较为科学的教学方法。其一是顺其志意积极引导。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戾痿。”③当然也不是完全随波逐流，是顺中有逆，逆中有顺，顺得自然，逆得柔和，使儿童不以为苦，易于接受。其二是以爱心薰陶感化，多作鼓励，使儿童心中喜悦，趋向鼓舞，则孩童必然求知上进。其三是适应儿童心理发展水平，在教育的层次上和科学内容上留有余地。他说：“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④“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只可授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⑤他生动地比喻说，如果小小幼芽便浇上一桶水势必淹坏他。正因为王守仁有这种批判意识，才使他的学说与教育思想独树一帜，以至于当时各书院，“不及阳明诸书院也”。

2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体系是博大精深的。但核心的东西是“致良知”。致良知是他哲学上的重要命题，也是他一生授徒讲学的基本精神。良知是什么呢？此言出自孟子。王守仁发展了他这种观点。他在《传习录》（上）中说：“知善知恶是良知。还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⑥所谓致，是培养和发挥的意思。“致良知”便是存是除非、去人欲而存天理。基于这一目的，王守仁把“致良知”的教育宗旨具体地贯穿到德育、智育、体育、美学诸方面。

以德为本是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他说：“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然予闻之，德有本而学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从事，高之而虚无，卑之而支离，终亦流荡失宗，劳而不得矣”。⑦关于德育的过程，王守仁强调了三个方面：

（一）他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向人们灌输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纲常伦教，借以维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他认为人所以变坏，是由于他们的良知被私欲和邪念蒙蔽了。那么只要去恶从善，恢复固有的良知就可以变好，用他的话说“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⑧他把这一过程叫明明德。王守仁把明德、天理比作精金，把才能知识比作铜铁，他告诫人们学圣人应求明德、天理之精纯，而不必非求才能知识之广博。在他这里德育与智育的关系从来没有含糊过。

（二）在德育过程中，强调人们的道德修养和品格意志的锻炼。虽然他的基本标准是封建的道德规范，但在客观上，他向人们传播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他要求人们树立远大的志向，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意志”。要成为这样的人才，光有志还不行，还要一点一滴地磨炼自己。为此他继承孔子省察克治、慎独等道德修养和办法，使人不断地去邪心、除恶念，一心一意地追求天理良知。在他多年的教育活动中，省察克治屡有所述。《传习录》上记载道：“省察克治之功，则天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儿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⑨这些精辟的论述，是王守仁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成果之一，对于我们今天个人的思想改造和自我修养也不无借鉴之处。在客观上以这种方式调整人际关系，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移风移俗，净化社会风尚。王守仁十分重视社会风尚对人们的影响。所以他在南

贛任职时开始实施社会大教育方案。从1517年起，他颁布了“十家牌法”等一系列文告，指导人们改革风俗，戒奢崇俭，破除迷信，使其孝亲敬长，奉公守法，讲信修睦。从而造成一个习礼守法，勤勉奋发的社会风气，以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把创造社会风俗当成教育的重要课题，王守仁的见解是颇具创造性的。

在智育方面，王守仁从培养人、造就新人的目标出发，将智育作为必要和重要环节。他广泛地挑选教材，认为凡是直接或间接有助于“心学”、“致良知”的都应该涉猎。然而，基础课不能脱离六经。他申明：“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伦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⑩他认为只有有针对性地学以致用，使心纯平无理，才算学到真径。为了达到他所要求的智育标准，他要求学生勤奋用功，象对待盗贼一样清除一切杂念，反对学习时“心猿意马，一缚不定”。为了锻炼学生的韧性和基本功，他把习字也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他说：“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在体育和美育方面，王守仁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他已在具体地实施了。如习射、弹琴、习礼、颂诗等教学活动他都十分重视。并以此来增强学生的体魄、美感，养成高雅的气质。全面发展，多才多能是王守仁教育的总体目标，达到了这个目标，便达到了他的最高理想——“致良知”的标准。

3 王守仁的教育方法，闪烁着朴素的辩证法的光辉。这里既有他对前人教育经验的总结，又有他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

第一，知行合一的原则。这是王守仁一切教育方法的基础。历来评论家对知行合一论多有异词，认为他等同了主观的心知与客观的实践，说他把知行看成是一个东西。对此笔者不能苟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的动机是为实践他致良知的教学内容。是要人们把一切恶念禁绝于萌动之时，特别强调人们在致良知时戒勉空谈。从这样的动机出发，他说：“知是行的始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己自有一个知在”。⑪这里，王守仁把知与行看成了一个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东西。从动机与效果来看是统一的，因为“真知必能行，不行非真知”。知而未行，只是未知。从层次上看知与行的推移又是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的。王守仁用食佳肴而后知美味，走路问路，遇歧路再问，这样由不知到知的例子，充分地揭示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在古代教育家当中，把知行关系说的这样透辟深刻还是不多见的。从知行合一的观点出发，王守仁重视实践，强调效果。他进行德育就主张“践履躬行”，“事上磨炼”，他讲智育就要求学生“伸纸执笔”，“操觚染翰”，致得真学问，写出真文章。他讲体育，就要求学生张弓挟矢，引满中的。他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⑫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学圃、砍柴、运水等农事劳作看成是致良知的圣贤之道。他的弟子中既有柴夫、陶匠，亦有农夫。重视实践到老稼之事，这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庸儒们高明得多了。当然，由于阶级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他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王守仁不可能把知行关系表述得完善、科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的认识从实践中来，经过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提到高一级的程度。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王守仁从“吾心”出发，经过实践，又回到了吾心，他的认识轨迹是在宇宙画了一个圆圈。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他超过了前人，也达到了同时代思想家的高度。这是王守仁对中国古代教（下转第113页）



体态语言是指人的头势、表情、眼神、手势、站立、行走等体态动作，在语文教学中它对再现教材内容情境美有着独特作用。它具有调节师生情感距离，促进思想交流，传达教材内容情感、暗示心理，表示态度，渲染气氛、意会功能。

四、挖掘科学知识的内涵美

科学知识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审美因素，但是这些审美因素并不是人人都能发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没有音乐的耳朵来说，再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如果没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作基础，没有理解掌握这些知识的头脑，是无法发现和欣赏这高层次科学美的。

在审美化语文教学的这四个环节中，科学知识的内涵美是中心，也是目的，是审美化教学成败的关键。它取决于教师的知识修养。实践证明，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不等于一个人的创造能力水平。当知识处于适应、记忆、理解和再现阶段时，人们是不具备多少创造性因素的。只有知识水平发展到较高阶

段时，才出现创造力。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有深厚的知识功底，才能挖掘出科学知识的内涵美，同时用精湛的语言，严谨的逻辑进行传授，使学生接受知识的同时感受到论证过程的公式美，判断推理的逻辑美、几何图形的线条美，运动变化的时空美……这种科学知识的内涵美，是物质世界背后的一种和谐力量，有的容易被学生感受到，也有的是通过理性认识而“悟”出来，有时这两种感受交替出现。科学知识的内涵美带有较强的严肃性。因为它不具有明显的直观性，所以这种美必须教师点拨，有意识地带领学生由浅入深地感受。这种美感一经形成就很难消失，那种顿悟，震惊令人终生难忘。做到这一点对培养学生科学美的美感，从而献身科学的远大理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使语文教学审美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去研究和探索，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付出辛苦和努力。

〔责任编辑 滕英超〕

（上接第106页）育思想的重要贡献。

第二，王守仁总结了我国古代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并依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独具特色的阐述。如循序渐进，他说：“吾辈致知，只是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

⑬他用胎儿筋力日强，聪明日长和给树芽浇水等生活中的例子说明循序渐进的道理，既主动又贴切。再比如“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他也阐述得十分地道。他认为天下没有统一的模式造就人才，必须充分注意学生的才力、分限。他用步箭、骑马射箭和远射的例子来说明学生各有所长所短，而作为教者，要象良医对待病人一样，对症下药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活动中，王守仁很重视“双边”活动，他不但对学生严格要求，耐心诱导，而且鼓励学生指出教师的失当之处。他说：“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⑭此外，王守仁还强调学生独立思考自求自得，反对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即使是权威、圣贤也不盲从。王守仁这些有益的论述，在今天也不失为经验之谈。

注：

①—⑭均引自《王文成公全书》。

〔责任编辑 滕英超〕

王阳明教育思想的特质与创见

方国根

王阳明生当明朝中叶正德、嘉靖年间,平生致力于“破山中贼”与“破心中贼”的宏伟事业,特别是在理论上力倡象山(陆九渊)之学,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构筑了更系统,更彻底和更富有理论色彩的心学思想体系,成为当时一种革新程朱理学的划时代的哲学思潮,曾风靡一时,广为流传,影响所及延至近现代。他的理论贡献不仅体现在哲学思想上超乎前人,而且表现在教育思想上也颇有创见。本文仅就王阳明的教育思想的宗旨、内容及其合理性作一粗略的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明人伦”的“尽心之学”

王阳明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自34岁开始授徒讲学,到57岁病死为止,无论是从政之余,还是在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的“干戈扰攘”中,都一直在不停地讲学。他说:“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亦未尝拒之。”(《王阳明全集》,《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广益书局民国二十五年版,下文只注篇名)即使是在新归服的少数民族地区,王阳明也主张“用夏变夷,宜有学校”(《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以图施教化民,长治久安。因此,王阳明每为官一方,都建学校,创书院,立社学。他在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创立龙岗书院,主讲贵阳书院;在巡抚江西时,立学舍,修濂溪书院,集门人于白鹿洞讲学,并讲学于龙泉山寺;总督两广时,兴办了思田学校、南宁学校和敷文书院。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包括教育目的、内容、原则的一整套思想,为我国古代教育事业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著名史学家郭沫若曾评价说:“王阳明对于教育方面也有他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王阳明礼赞》,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3,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与他的哲学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他的教育学说是其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他从“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本体论出发,主张“心外无学”(《紫阳书院集序》),认为天下不治,士风衰薄,学术不明,都与没有豪杰之士倡导“圣学”有关:“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送别省吾林都宪序》)因此,他作为官各地,主张重教兴学。他在南宁“新创敷文书院”时说:“看得理学不明,人心云云,除行该府掌印官率属敦请外,仰本官就于新创敷文书院内安歇,每日拘集该府县学诸生,为之勤勤开海,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牌行委官季本设教南宁》)这里,王阳明所谓“兴起圣贤之学”,即他倡导的“良知之学”,就是讲授和宣传他那一套“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世界观和道德论。他指出:

良知之学,不明于天下几百年矣。世之学者,蔽于见闻习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无假于外也。皆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纷纭交鹜,以私智相高,客气相竞,日陷于禽兽夷狄